



2021,看见与再见

变成星星的人



2021年8月,重庆长虹村,袁隆平形象的稻田画。



2018年4月13日,96岁的吴孟超为患者进行手术。



2010年,李泽厚在上海。



2014年,史景迁在北京大学举行讲座。



2021年9月18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今年以来去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举行熄灯仪式。



2008年,沈昌文在北京三联书店外。 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 杨杰

2021年,一些人离开地球,成为星星。5月的一天,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相继离世,后者在10年前得到第17606号小行星永久命名。现在,人们只能像遥望星星一样遥望他们。

茨威格说:一个民族,千百万人里面才出一个天才,人世间数百万个闲暇的小时流逝过去,方始出现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人类星光璀璨的时辰。

这一年有11位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101岁的何塞普·阿尔穆德维尔·马特乌也走了,他是西班牙内战中国际纵队已知的最后一位战士。

也有人在这一年永远留在了他们热爱的大自然。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留下了梁晶等21名参赛选手;乔戈里峰埋葬了智利的胡安·摩尔、巴基斯坦的阿里·萨帕拉、冰岛的约翰·西古尔森。11月,4位中国地质人员在哀牢山测量自然时,被自然吞噬,闭目于大树之下。

新型冠状病毒依旧危险又冷酷,截至12月25日,全球有482万人在2021年因新冠肺炎去世,包括印度宝莱坞的作曲家、阿尔及利亚前财政部长、柬埔寨的电影制片人、古巴的棒球联盟会长、海地的法学家、新加坡的画家、乍得的前总统

死去元知万事空,生者惟以回望缅怀。

1

人们喜欢用“时代落幕”形容大人物的

离开,2021年是时代反复落幕的一年。

袁隆平去世的那天,许多人哭了。他是国民知晓度极高的科学家,出现在语文课本里,也活跃于“还是让你们吃得饱了”的表情包中。

他身体的底子不错,20岁出头,通过空军飞行员选拔,但因抗美援朝战争已结束并未入伍。同年,他代表川东区参加西南联赛游泳锦标赛,获得第四名,再升一个名次,他就能进入国家队了。

差一点成为体育健将的袁隆平,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于校外瞥见两具饿殍,深受刺激,决意研究粮产。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1967年,他带头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成立,每年去三亚育种,甚至把种子绑在身上,用体温育种催芽。

今年3月,袁隆平在三亚杂交水稻研究基地跌倒,4月转至湖南治疗,5月22日,他因多器官功能衰竭逝世,走完了91年的人生。

同一天,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也走了,追思活动没有像往常一样奏哀乐,而是换成了《国际歌》。

中国曾集中了全世界半数左右的肝癌病人。但直至新中国成立,肝脏外科还是一片空白。在老师裘法祖的建议下,吴孟超开始了“卧薪尝胆”的一生。

2011年,88岁的吴孟超在一年内主刀完成190台肝肿瘤切除手术,创造了外科医生年龄最大还坚持做手术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他对手下的医生颇严厉:你干吗非要用那个器械,只用一下,咔嚓一下几十块钱,病人的负担该多重,你不用手术线?

那一根才多少钱?

对病人则又换了副面孔。他的手一摸在病人的脑门上,病人的眼泪就掉了下来。肝病病人,家里人都害怕被传染,一只手的温度能持续许久。

另一位104岁的医生松了手。葛秦生是中国妇产科内分泌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协和医院的告别厅内,人们手持红玫瑰为她送行,棺木中放上了她主编的第一版《临床生殖内分泌学》。她一直致力于治疗不育症的探索,许多生命得以降生。

2

死亡确乎是每个人都有着的无定的必然,向死亡走去确乎是每个人都有着现在进行时。但为什么一定要时时刻刻惦记着这个必然呢?为什么不可以忘记它(儒、道)或即使不忘(禅)却仍然去热情地肯定和拥抱生活呢?这同样可以领悟到那存在的虚无吗?

说出这段话的哲学家李泽厚在北京时间11月3日去世,他曾说父母在40岁之前去世了,自己活到91岁是种偶然,他家中摆放一个骷髏,用以迎接死亡。

90岁被问及人生感悟时,他答至今未悟。12岁时,他在家乡的山头上看到一片山花烂漫,却突然感到,我要是死的,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生死之谜在那个瞬间击中了他,他后来回忆,这大概是我对哲学感兴趣的最初起源。

去年春天,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镇,李泽厚写下:春风三月,凭窗远眺,但见白雪覆顶的洛基山脉,再也看不到那满山红艳的杜鹃花和金黄色的遍野油菜花

了,怅何如之。

一年后,他在美国逝世,传至国内,知识分子界悲恸,又一位思想者归于星辰。年初,90岁的出版人沈昌文在一个清晨去世。他主编的《读书》杂志曾是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

沈昌文在回望过往时,曾说自己干了一辈子出版,读书无数,却不是文墨中人,只因多年皆为功利而读书,一不为兴趣,二不求真理,只是图出息。直到退休之年,所读之书,只服务于我这老人的兴趣。

沈昌文曾主阵的《读书》记录了另一位巨擘的逝去。历史学家何兆武于今年5月离世。

这里躺着一人,他把名字写在水上。这是何兆武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也是齐慈的墓志铭。齐慈26岁就死了,英文里有一句谚语是说,把名字写在沙子上,潮水一来就冲走了。把名字写在水上就更彻底了,一边写一边就没有了,就像古诗里说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

他一生波澜起伏,却说写出来没多少意思。他离开后的一个月,翻译界泰斗许渊冲也走了。

他把《关雎》译作《Cooing and Wooing(春和求爱)》,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向外国人展示中国古诗的美;在《老子译话》的论文里,他把“道”理解为 divine law(天道)。本报记者曾采访过许渊冲,他人送外号“许大炮”,特点是狂,曾说过“傅雷翻译的不如我,名片上印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

耄耋之年,许渊冲仍然制订了“每天翻译1000字”的工作计划,93岁时他决定翻

译莎士比亚全集。别人劝他歇一歇,他说:翻译的快乐对于我就像水和空气,沉浸在翻译的世界里我就垮不下来。

对于狂,他觉得我们中国人,就应该自信,就应该有点狂的精神。

一位对中国人理解深刻的外国人刚刚离世。12月26日,汉学家史景迁走了,他把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事,通过历史考证,以说故事的方式讲述出来,让西方读者得以认识一个丰富的中国。与他共事10年,也在今年过世的余英时称他高雅温厚。研究历史的他成了历史。

史景迁说,在整个世界的版图上,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极有魅力的存在。西方人需要花长时间去消化分析他们拿到的资料。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

3

这一年,一些从年龄上看,离死亡很远的人也走了。

32岁的投资人魏萌意外去世,38岁的“神童”魏永康离开了。47岁的诗人胡续冬再也无法拿起笔,所有人谈起他的时候都是一脸笑容,很快乐的样子。

这位并不知名的诗人,受到很多人的缅怀。2021年,我们失去了那么多不为人知的配角。

吴孟达也许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个。我们不在意他主演过什么影片,只能回忆起他在周星驰身边或疯癫、或痴傻、或一本正经的样子。

另一位脸熟却叫不出名字的香港演员

永远的怀念

纪念陈省身先生诞辰110周年



陈省身(1911-2004) 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整体微分几何之父。2004年,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陈省身星,以表彰他对全人类的贡献。

□ 张伟平

2021年是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诞辰110周年,许多前辈和同仁撰写纪念文章,从各个侧面追忆陈先生的杰出成就和对我国数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作为陈省身在南开数学研究所招收的最后两名学生之一,一直难忘陈先生对我的关怀和培养。这里也写下我与陈先生交往的回忆点滴,作为我的纪念。

最早见到陈先生,是在1986-1987年南开数学所举办的“几何与拓扑学术年会上”。我作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生到学术年听课。那时当然只是远远地、满心崇敬地领略大师风采。记得那一年的硕士生导师袁言林教授应邀陈省身先生在学术年讲授 Dirac 算子的 Atiyah-Singer 指标定理,使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青年学子受益。而袁老师转述的陈先生的话,即使出了文章,也要搞指标定理,到现在也是言犹在耳。

陈先生的另外一句话也对我影响深刻,就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学好数学,不一定非要考托福到美国去。受此影响,我和我的中科院同学周向宇后来都没有去考托福。

具体和陈先生的接触,源于袁言林老师的大度。在我硕士快毕业时,我找袁老师说愿意跟他继续读博士。袁老师说我跟

着他没有前途,要推荐我到南开跟陈先生。这个我当然不能说不。当然,陈先生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招学生。在袁老师向他推荐后,他提出要我先到南开做一个报告。这样,我和陈先生的第一次接触,就是在他面前做学术报告开始的,当然很紧张。记得我做完报告后,陈先生对袁老师评论说了一句:想在较短的时间内讲太多的东西,年轻人就这样。这样就算过关了。当然,在正式进入南开前,还需要和所有人一样经过国家统一的博士入学考试,幸好我也考过了。和我同时考取陈先生博士生的还有北大毕业的王长平。因为他的年龄比我大,所以我称他为师兄。

1988年秋天,我和长平就正式成了陈先生的学生。记得第一次一起去见陈先生,陈先生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消除了我们的忐忑不安。当时陈先生对我们说,他想辞掉南开数学所所长的职务,专心做数学,但有关部门不同意,所以他没有时间带我们俩,要我们出国;并且说,一个去德国,一个去法国。特别地,他和我说法国的马利亚万(Paul Malliavin,概率论大家,编者注)问他要好的中国学生,所以他推荐我去跟马利亚万学。

我回来后向袁老师汇报了陈先生的想法。袁老师建议我最好去美国跟奇格(Jeff Cheeger,几何学家)。所以等到下一次我和陈先生单独见面时,我就讲了袁老师的想法。陈先生说,奇格已经有了太多的中国学生,而且到美国要做TA(助教)要教书,到法国可以集中时间做学问。我当时也太年轻,没有一下子松口,两人就有点儿僵住了。过了一会儿,陈先生说:我手头还有一封信没有写完,你先回去,我们明天再谈。

我回来后想了半天,觉得跟老先生辈也没什么意思,所以第二天见到陈先生就说我可以去法国。而到了下次见面,陈先生开口就说给马利亚万的信已经寄出了。这不由使我万分感慨:照一

般来说,导师让你去一个地方你不去,那你什么地方都不要去了。所以第一次的接触,陈先生的大师胸怀,就给我这个年轻后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等到了第二年陈先生回国,见到我后,告诉我他和马利亚万谈过了,要我到法国后跟比斯姆(Jean-Michel Bismut,几何学家)。对此我就更没有意见了,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做的就是比斯姆的东西,而比斯姆和奇格也共同获得了2021年度邵逸夫数学奖。

那个时候因为法国没有奖学金制度,所以到法国留学的通常途径就是走原国家教委的联合培养。但是,1989年,中法关系跌至低谷,到我具体联系出国的时候,中法联合培养项目被无限期拖延了。陈先生这年秋天回国得知以后,也很焦急。那时他刚从法国领了外籍院士证书回来,就以法国外籍院士的身份约见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并亲自到北京的中国大使馆,要把政治和学术分开;然后又到原国家教委找到有关领导,说将我的材料单独抽出办理。我有时想想,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学生,哪当得起大师的如此举动。而陈先生自己对我说,他觉得帮我做过两件事(何止呀)这个算其中一件。

另一件事发生在我1993年从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不久。那个时候我回到南开,从助教做起,每月工资200多元,生活显然颇为拮据。陈先生知道后也有些惊讶。1994年10月,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在报纸上公布了青年教师基金和青年教师奖获得者名单,陈先生觉得可以为我争取这个资助,因为他是评审委员会委员。不久,评审委员会要在北京开会。当时陈先生在天津患了重感冒,大家都劝他不要去了,但他坚持要去,为我争取资助。据说他专门找霍英东先生谈话,感动了霍英东和其他评委,决定给我一笔相当于一等奖

的资助。但是因为其他获奖者名字已经登报了,所以我的资助只给钱,名字不见报。这可能在整个霍英东基金和奖励获得者里面也是绝无仅有的吧。

我清楚记得,那天我去南开见陈先生,陈先生说我给你争取到了霍英东基金,你可以再考虑出去一年。而我回答,累了,就先待在国内休息休息了。也算是经受了了他的考验。

说到奖,我得的其他两个奖,也和陈先生有关。第一个是1995年起颁发的香港求是基金会“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记得1994年上半年,我在加州伯克利的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MSR)做博士后,李安民老师也在MSRI访问。有一天我们一起去陈先生家,正在斯坦福大学访问的田刚教授也在。陈先生当着我们的面说,求是基金会会有这样一个奖,鼓励在国内工作的学者。记得李老师当即就表示,如果这样他更安心在国内工作了。后来1995年第一批获奖名单公布,李老师和霍英东基金一起,经我在南开的生活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另外一个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现已更名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数学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数学奖。第一届获奖者是陈先生早年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北京大学的廖山涛先生。在我之前的获奖者还有吴文俊先生和张恭庆先生。1999年7月的某一天,我忽然收到陈先生的一个传真,直接说:我拟推荐你为TWAS Award,令我受宠若惊。可能是由于陈先生的巨大威望,我最后顺利获得了2000年度TWAS数学奖。记得获奖后张恭庆院士还专门给我写了贺信。有了这个奖,经由姜伯驹先生提名,我又于2001年顺利当选了TWAS院士(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名TWAS院士需要在本国先当选院士的要求)。而有了这个TWAS院士头衔,我就可以在2004年就任南开数学研究所所长伊始就提名龙以明教

是廖启智,从上海滩时期的周润发,到无线五虎将的梁朝伟、刘德华,再到后期小生林峯、谢霆锋,廖启智都曾指过。他演了一辈子,年纪很大了,一直坐公交车去片场。

今年去世的演员还有演《三国演义》里的曹丕、演《红楼梦》中贾蓉的杨俊勇,《杨贵妃》里的周洁,谢大脚、于月仙。他们的离开,带走了80后90后的部分青春。

一位真正不知名的逝者是56岁的中国邮政递员王顺友,他每年有330天骑着一匹马独自行走在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的马班邮路。他平均每月投递700份报纸、28份杂志、45封信、25件印刷品和5件包裹,没有延误过一期邮班,也没有丢失过一件邮件。今年5月,他因病离世,不知道哪位同事将继续牵起他的马。

青年考古学者刘拓生前最著名的新闻是在伊拉克旅游时被政府军误抓。

他的工作常围绕危险存在,他的相机里,有芦山地震后的歪斜的铁索桥,有石碑经幢孤零零地立在农田里。他从2013年开始踏足中东,去过以色列外的所有中东国家,包括刚打过仗的和正在打仗的。

今年10月,刘拓在四川马尔康市甲尔甲山考察洞窟壁画过程中坠崖去世,只有31岁。

另一位与他同龄的年轻逝者储昌安,是一位医生,死后,他为医学贡献自己最后的余温,将遗体捐献给母校。

和他选择同一种方式“回归”的刘雨橙,是成都医学院一名普通的大四学生。她在一场车祸中意外身亡,以大体老师的身份回到学校,院系的师生手握鲜花默哀,音乐里播放着西城男孩的《You Raise Me Up》。

出事的前两个月,她刚度过了21岁的生日,发了一条QQ动态:一岁一礼,一寸欢喜,我已亭亭,无忧亦无惧。

普通人的离开同样令人悲痛,逐渐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正在一个个远去。9月去世的黄刘氏曾说:那时候我们跑反,我打扮得不像个人样,脸上抹着黑灰。我们亲眼目睹一个撑船的女船家被日军打死了。第二天走的傅兆生先生说:从历史走来,所以我更珍惜如今丰衣足食、孙儿承欢膝下的幸福。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地下二楼有幸存者的照片墙,每当有人离世,照片背后的灯就会熄灭。今年11盏灯灭了,11颗星星亮了。

人们理所当然地记住了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也走了。

32岁的投资人魏萌意外去世,38岁的“神童”魏永康离开了。47岁的诗人胡续冬再也无法拿起笔,所有人谈起他的时候都是一脸笑容,很快乐的样子。

这位并不知名的诗人,受到很多人的缅怀。2021年,我们失去了那么多不为人知的配角。

吴孟达也许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个。我们不在意他主演过什么影片,只能回忆起他在周星驰身边或疯癫、或痴傻、或一本正经的样子。

另一位脸熟却叫不出名字的香港演员

基金,对中国数学的发展持续发挥作用。我个人记忆十分深刻的是2000年1月12日,师母郑士宁在南开寓所安详离世。第二天,我去看陈先生,只看见陈先生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但陈先生忍着不让他掉下来。他对我说:我目前就做好两件事,一个是要办好国际数学家大会,二是要办好南开数学研究所。

我们看到,陈先生后来为这两件事倾注了几乎全部的心血。他独具匠心地在南开举办周炜良、陈国才纪念会、代数拓扑与代数几何国际会议,促成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接见国际数学联盟主席,为国际数学家大会首次在中国召开(2002年在北京)铺平了道路;同时他又提出建造南开数学所新大楼,为南开数学研究所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实体保障。

为中国数学和南开数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陈先生1985年在南开数学所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成为他身体力行的准则。2005年底,陈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南开数学所更名为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江泽民同志亲自题写所名,充分体现了国家领导人对陈先生及其贡献的高度肯定。

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在陈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盼望中国成为数学大国、强国的陈省身猜想,尽早得到解决。

(作者系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



2004年,数学家陈省身(左二)与张伟平(左四)、刘克峰(左三)、周向宇(左一)等人在浙江嘉兴